

综 述

天津 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 东临渤海 地近北京。京山铁路和津浦铁路在此连接 使天津成为东北、东南入京的门户。流经华北的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 汇成海河 横贯市区 东流入海 使天津成为华北内外交通的枢纽。它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一百多年来 列强多次从这里入侵 并在此建立租界为基地 进而威胁、控制首都北京 企图实现吞并中国的罪恶目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战略——‘征服’中国的咽喉 天津 正是这样设想而策划的。

1894 年 日本通过其称为的“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政府。根据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于 1898 年在天津强划 1667 亩土地辟为日租界。1900 年 7 月 日军出动 2200 人作为八国(英、法、俄、美、日、德、意、奥)联军主力部队之一 入侵天津 首破天津城 继占北京 会同列强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随后趁机扩充日本租界至 2160 亩。此后 30 多年 日本侵略者以种种手段,肆意侵占土地 至 1937 年,日本占有土地达万亩以上。

天津日租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桥头堡,是对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这里军、警、宪、特一应俱全 各种名号的侵略组织应有尽有 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日本的天津驻军始于 1900 年 初称“北支那驻屯军”原为一支负责保卫使、领馆和护侨的部队。“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的侵略矛头指向华北时 驻军人数猛增至 8000 人 已成为司令部拥有“8 部 2

班”步、骑、炮、装甲、通讯、航空等兵种齐全的先锋军。1937年7月底，侵华日军迅即占领平津，是和华北驻屯军的内应密不可分的租界内的警察署（时称“白帽衙门”）本应是管理侨民、维护治安的机构，而日本当局怀着军事目的大力扩张，到“七七”事变前已在天津和津山铁路沿线设有近10个分署，成为专事搜集情报、破坏抗日活动、为侵略政策服务的马前卒。日本警察署还包庇、掩护日、朝浪人走私、贩毒，是日本实施“特殊贸易”的“保护神”。宪兵是整饬军风纪的军事警察，但天津的日本宪兵队本部（时称“红帽衙门”）却是辖2个分队、6个分遣所和1个出張驻在所，专门镇压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宪兵队里刑讯逼供，凶残暴戾，无所不用其极。“进了宪兵队，不死也得受洋罪”人们称之为阎王殿。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机关在天津多如牛毛，诸如青木公馆、茂川公馆、松井公馆、和知公馆、斋藤公馆、三野公馆等。这些特务组织各司其责，效命于日军的侵略战争，如：使天津人民深受其害的“便衣队暴乱”，就是三野公馆制造的。再如：天津沦陷后迅即出笼的伪政权——天津治安维持会，则是茂川公馆策划组织的。日本特务机关是侵华日军的别动队。日本驻津总领事馆也是执行侵华政策的重要机构，是管辖冀、鲁、晋等省各地领事馆，控制华北的中枢。日本侵略华北的历次事件几乎都与其有关。1935年10月在津召开总领事会议后，同年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就鸣锣登场，成立了冀东伪政权。1937年5月在津召开华北领事会议，两个月后就爆发了“芦沟桥事变”。凡此种种，可见一斑。此外，日本居留民团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侵略势力，他们以自治组织为名，行为侵华政策服务之实，是一支十分危险的“第五纵队”。居留民团不仅有情报机构（名为“调查课”），还有一支不逊于正规军队的武装——日本义勇队。这支准军事组织，直接参与了日军侵占天津的战斗。为此，日本军部和外省均授予它特殊奖赏。

综上所述，日本租界既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又为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埋藏在天津这片沃土中的“定时炸弹”。

1931年日本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侵华的逐步扩大，对天津的侵略活动也加紧进行。11月8日和26日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策划下，以租界为掩护，组织一批汉奸、流氓武装袭击中国政府机关，趁机挟持废帝溥仪赴东北，制造了“天津事变”（即便衣队暴乱事件）。1933年日本逼使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军在长城以南，包括蓟县、宝坻、宁河（今属天津市）在内的支配地位，使华北门户洞开，北平、天津受到严重威胁。日本为了实现其“大陆政策”，积极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的“自治运动”。1935年6月又签订中日《何梅协定》（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要求包括驻在天津的中国军队撤出河北省。11月在天津的日军网罗一小撮民族败类，上街游行示威，制造要求“自治”的骚乱。

1936年日本为加紧推行“华北特殊化”，在经济上大搞非法走私，在日租界成立“特殊贸易协会”，专事组织走私活动，近300家洋行、商店参与运销私货，造成天津白银大量外流，民族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日本大量输出资本，在天津兴办企业，使日资企业的数量跃居外资企业第一位。天津纺织业几乎被日资垄断。棉花、羊毛、煤、盐被源源运往日本。仅长芦盐一项，至1936年，就使中国损失45568万元。在军事上，日军积极备战。1936年5月日本将“天津驻屯军”改称“华北驻屯军”，其司令官原由陆军部任命的少将级，提升为天皇任命的中将级。同时加紧机场、兵营、仓库等军事工程的修建。日军为防军事设施泄密，将几百名被驱使的中国民工残酷杀害，沉尸海河，酿成震惊天津的“海河浮尸案”。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北支事变”（即芦沟桥事变），随后，10万日军包围平津地区。天津国民党第29军爱国官兵为挽救民族危机，于29日凌晨2时向日军发起反击。日军

出动飞机、大炮、步兵、骑兵 疯狂轰击市政府、警察署、电台、车站、工厂、学校。南开大学及许多重要机关、工厂被炸成废墟，2000 余人死于日军战火，10 万余人无家可归。30 日，日军占领了天津。从此，天津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过着亡国奴的生活。

天津沦陷后，日军为实现其“以战逼降”的目的，大举南侵，先后发生惨案多起。在武清县崔黄口镇、静海县王口镇都发生了一次残杀百人以上惨案。1939 年，日军发动了空前残酷的“治安战”，在天津地区滥杀无辜。蓟县上仓镇就有 300 余村民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日军的血腥统治是建立在刺刀上的，妄图以血与火摧垮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仅据我们所搜集资料的不完全统计，日军在 8 年中，在天津地区制造惨案 37 起，残杀中国人民近 3 万人。

1940 年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后，积极推行“南进”政策，7 月 26 日发表的《基本国策要纲》提出“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结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或曰“大东亚共荣圈”，是一个包括西伯利亚东部、蒙古、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和大洋洲的狂妄计划。为此，日本大力调整内外政策，9 月 27 日，日、德、意结成重新瓜分世界的“轴心国”，日本国内掀起“万民共赞的举国新体制”运动，强化法西斯统治的战时体制。对中国占领区制订了《支那事变处理要纲》，侵华战争开始转入“彻底整顿占领地区治安状况”的“长期持久战体制”。从 1941 年 3 月至 1942 年 12 月，由日本华北方面军组织实施，殃及天津和华北各地的“治安强化运动”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笼的。日军通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体战”方式，更加残酷地统治占领区人民，摧残抗日力量。沦陷区人民在日军刺刀下，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处境维艰。

日本统治天津后，采取惯用的“以华治华”政策，豢养一批民族败类、社会渣滓，成立“天津治安维持会”（后改为市公署、市政府），作为统治天津的傀儡政权机构，由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派出特务充任各级顾问加以控制。此外，在日军唆使、把持下，还成立了“新

民会”、“剿共委员会”、“警防团”以及“袁部队”、“义侠队”等汉奸、流氓组织配合日军镇压天津人民的抗日活动。在日军怂恿下这些人非作歹、肆虐津城，诸如制毒贩毒、开设赌场、设立妓院、诱骗民女充当“慰安妇”等等，给天津人民带来无穷灾难。

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日军在华北及平津地区先后实施以“反共”、“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的“治安强化运动”。天津伪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宪、特，把守主要路口检查行人，对市民言行、日常生活和思想状况开展调查，被认为“可疑者”则加以监视或搜查住宅。在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中，以加强经济掠夺为主，成立专门机构，强制市民“献铜”、“献铁”、“献机”（飞机）“献金”（钱）。1941年仅一次“献金”活动就搜刮去37.6万元。伪新民会通过摊派征款，竟购置飞机97架支援日军。更有甚者，强行拆卸华资纱厂机器，以“献铁”支援“圣战”，致使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在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强制推行“代用食粮”、“配制难以咽的‘混合面’”，人民苦不堪言。

日军侵华，经济上施行“以战养战”政策，占领天津后，以“经济开发”的方式，大肆进行经济掠夺。1938年4月，成立“华北开发股份公司”，下属有盐业、电力、交通等子公司。仅天津滨海地区盛产的长芦盐，日本通过华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几年间共掠夺400余万吨。天津的电力供应、铁路、公路、水路交通，多被开发公司所控制。这种开发公司，按其规定，中方出资45%，日方出资55%，中方资金以现金和实物、设备、器材投入，而日方多以军用票、公司债券或以技术代替，具有明显的掠夺性投资性质。此外，日本在天津建立的冶金、机械工厂近百家，几乎都直接为日军服务，成为日军的兵工企业。

天津是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日本对天津金融业的掠夺性政策，使天津物价飞涨，沦陷期间物价指数上涨近千倍，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天津是小站稻米的产区，华北粮、棉主要出口地。日本通过华北垦业公司、米谷统制会、棉业协会，严格统制和低价收购进行掠夺。稻米被定为军用食粮，严禁天津人民食用。棉花每年从天津运走近 300 万担。日本还在天津周围农村，以圈占、低价征购手段掠夺土地，设立 120 个农场，为日军生产农产品。

日本为了掠运物资的需要，1939 年日本兴亚院制订《北支那新港计划》，兴建塘沽新港，计划每年将从新港掠运 2670 万吨物资。日本投降时，仅新港几百平方米的第二码头，未及运走的煤炭堆积达 3 米之高。新港还是日本输送华北劳工的主要港口，在这里设有待运出口、地狱般的劳工营。千万华工从这里运往日军占领的东北、朝鲜和日本本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无数中国劳工命丧异国他乡。

伴随着政治上的专横统治和经济上的压榨掠夺，日本侵略者在文化教育方面实行了一系列毒化、奴化政策，妄图从精神上摧毁中国人民，造就一批供其驱使的“皇国顺民”。

日军占领天津后，在文化领域实行“又拉又打”政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对不与日伪合作者残酷迫害。爱国教育家赵天麟、著名报人刘髯公、生宝堂等一批文化人遭到血腥屠杀。与此同时，日军收买、豢养了一批御用文人，大肆吹捧“皇军的赫赫战功”和“王道乐土”的盛绩，泡制诲淫诲盗、神奇怪诞的电影、戏剧、书刊，致使这些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到处泛滥，为害匪浅。日军对舆论严密控制，通过“新闻管制”取缔报刊、通讯社 20 余家。还多次查抄、焚毁进步书刊，使天津成为毒草滋生地。日本当局还利用宗教和形形色色的封建会道门，鼓吹日本的侵略是为了“拯救东亚人民”，是“符合公教教义和道德原则”的“仁义之举”，进而组织为“圣战”祈祷，麻痹人民意志，为侵略战争服务。“一贯道”就是其中的一个日本侵略者的得力工具，在搜集情报、抓捕华工和腐蚀人民意志等方面干尽了卖国殃民的勾当。在教育方面，日本极尽摧残、奴化之能

事。日军对天津的入侵，使两所著名高等学府——南开大学、北洋工学院，一所被毁，一所被占为兵营，受到严重破坏。日军还强占 10 余所中学驻兵，致使众多学子因之辍学。1938 年起日本当局通过颁布“统一校训”、废止原教科书、改用新课本、添授日语课、派出日籍教官等措施，推行奴化教育。1941 年日伪实施第 3 次“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强令各校举办以宣讲“中日同文同种，共存共荣”、“日满华三位一体”等为内容的展览会、恳谈会和幻灯讲演会，加强奴化教育。日本当局还强令青年学生参加“新民青少年团”，接受军事训练，参加“勤劳奉仕”，对学生灌输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实现“王道乐土”的奴化意识。1943 年，在推行“新国民运动”中，更要求青少年学生“肃正思想”、“革新生活”，做日伪“剿共建国”的先锋。

日军在天津统治 8 年，犯下累累罪行，天津人民迄今记忆犹新。今天，我们披露这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意在不忘历史，不使历史的悲剧重演。中日两国人民都要从中吸取教训，让已经建立起来的中日友谊，世世代代发展下去。以史为鉴，可以明志，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书的目的。

（王林）

天津市区简介

天津市区总面积 2073 平方公里 总人口 459.38 万人 划分成和平、河西、河北、河东、南开、红桥、东丽、西青、津南、北辰及濒临渤海的汉沽、塘沽、大港 滨海地区另文介绍 共 13 个行政区 是天津市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

天津自明朝永乐三年设卫筑城以来，至清雍正九年便成为辖六县一州的畿辅首邑。作为滨海防卫的重要门户，随着盐业、航运业的发展繁荣，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天津的城市规模也随之逐渐扩大，形成保卫北京 辐射三北（东北、西北、华北）的经济、文化中心 军事地位也日益重要。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强行在市内划定英、美（后并入英）、法、德、日、俄、意、比、奥八国租界 天津遂沦落入世界列强的魔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便开始了从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加紧吞并华北和天津的侵略活动。到“七七”事变前夕，天津已被日本经营成侵略华北的兵站基地，为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打下了物质基础。

1937 年 7 月 29 日 面对日军对天津日益频繁的军事挑衅 国民党第二十九军部分官兵在李文田将军的指挥下奋起反抗，但在日军空中、地面炮火的猛烈攻击下，终于被迫撤退。天津城除英法等国租界外（英、法等国租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被日本接管）全部落入敌手。日军狂轰滥炸使天津市区遭到巨大破坏，许多市政

设施被毁 无数居民丧命 人民流离失所。天津著名的学府南开大学也毁于一旦 成为一片瓦砾。

宪兵本是整饬军风纪的军事警察，但侵华日军中的宪兵队却成了镇压人民的机关。宪兵队和日本警察署被人们分别称作“红帽衙门”、“白帽衙门”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建立殖民统治的两只非常凶恶的鹰犬。他们随便抓人杀人。沦陷时期的天津人民任敌宰割 根本没有起码做人和生存的权利。为了加强对广大中国人民的殖民统治 对付抗日力量，搜刮战略物资 日伪在津先后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以疯狂的烧杀掠夺 支持其侵略战争。

利用形形色色的汉奸、民族败类 组织“维持会”、“新民会”等汉奸组织 是日本在天津统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些地痞、流氓、汉奸 大肆掠夺各种物资 搜刮民财 制造“便衣队事件”走私贩毒 抓捕华工 强征军妓 无恶不作。

日军侵占天津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并以天津做为掠夺华北的中心。日军先是以“军管理”的名义 对天津的企业进行野蛮的掠夺 以后又以“米谷统制会”、“棉花改进会”或日商企业的名义 强行垄断重要的行业、产品 低价收购各类物资以充军用。大批华资工厂、银行、商号等 或停业倒闭 或为日军控制。随着侵华战争越陷越深 资源日益枯竭 日本在天津对战略物资的掠夺也更加疯狂。抗战后期 日本占领当局多次强迫天津人民进行“献铜”、“献铁”、“献金”、“献机”运动。对广大市民实施粮食配给制 稻米成了日军的军粮 绝对不准中国老百姓食用。日伪当局强迫人们食用“代用粮”用豆饼、花生皮等杂物磨成的“混合面”充饥 就是这些东西 也限量供应。天津人民在饥饿中挣扎度日 街头巷尾常有人因饥饿而死亡。

沦陷期间，日本占领当局竭力推行毒化中国人民的文化政策，开展奴化教育，妄图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以维持其殖民统治。他们强迫在校学生学日语，推行为其侵略政策服务的伪教材，

并派日本教官监视师生的言行。对于抵制奴化教育的爱国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著名教育家赵天麟即死在他们的枪口下。

日本占领当局非常重视对舆论的控制，他们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宣传侵华战争的“合法性”，极力鼓吹“大东亚共荣圈”。对于爱国的报刊，不但强行查封，而且还对其中的报人或威逼利诱，或疯狂迫害，企图彻底扼杀人民的反抗思想。

为了进一步从精神上、肉体上毒害广大人民，日伪在天津还大肆制造、贩卖各种毒品，市内一时烟馆、土膏店林立，一片乌烟瘴气。这些“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还以肆意传播封建迷信和黄色书刊为手段，妄图摧毁广大人民的抗日意志，使中国人安于其殖民统治。

日本侵占天津的八年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残酷的法西斯殖民统治，把天津这一著名城市变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钱钢）

南开大学 惨遭洗劫焚毁

南开大学始建于 1919 年，是一座国内外闻名、有着优良学风和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新中国建立以前就曾为社会培养出无数的有用人才。校内建筑恢宏，花木扶疏，整洁安谧，芳草如茵，有秀山堂、思源堂、芝琴楼和藏书近 15 万册的木斋图书馆。特别是铸于晚清的海光寺大钟和钟亭，更以“八里台钟声”构成津门胜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势力的矛头逐渐以得寸进尺之势指向华北。那时，天津不但有日本租界，而且还有日本驻屯军和日本兵营，在海光寺、南开大学附近，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略华北的重要据点。南开大学自“五四”以来，以周恩来、于方舟为代表的广大师生积极投身于历次反帝爱国运动，成为天津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洪流的中流砥柱。因此，日本侵略者把南开大学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从 1932—1937 年这几年中，南开大学几乎每天都有“日本来宾”光临，其中什么人都有——官吏、和尚、尼姑、妓女，也有冒充政客和学者的浪人与特务，很少是正派人。他们来了就要参观，那课堂、学生宿舍、图书馆等都要进去看看，特别是经济研究所，查询他们特别关心的所藏经济资料。

最令人气愤的是，日本在津“驻屯军”把南开大学校园当成他们的练兵场。在男生宿舍前的体育场构筑机枪阵地。在秀山堂门前空地演操练武喊口令和打靶。机枪嘎嘎声扰得楼内无法上课。南大为应付日寇骚扰，专设一位校长秘书，由日文专家傅恩龄担任，

出面向日本军官交涉。告诉他：“这是我们的课堂 正在上课。”日本军官假意撤兵而去。但第二天又来操练 用耍无赖的办法坚持不断骚扰。当时的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以学校名义向日本驻津领事馆提出抗议时 日本领事竟倒打一耙 说：“你们取缔抗日 军队就不来了。”

1937年秋“七七”事变爆发后 北平附近的战争打打停停 时局不定 麻痹了我们的警觉性 致未能先期做好未雨绸缪应付天祸的准备。直到 7月24日 才感到天津已有不保之虞。南开大学也在学校遭遇上感到日本人要下毒手了。日本领事馆派人来南开大学 要求会见学生马大恢 学生会主席 和沈世杰 学生抗日组织民族先锋队的负责人)意图把他们骗去逮捕。此时还在暑假 学校则以学生已放假回家而拒绝。随后来了一队日军,说丢了一支步枪,要进校检查 也被婉言拒之。黄钰生和理学院院长杨石先教授商定立即组织学生疏散,组织教职工眷属搬迁疏散到英租界的新学书院临时借用地点去,并开始把一部分图书和仪器转移到英租界的金城银行仓库。但由于交通工具的困难 在这几天里也只转移了贵重校产的十分之二三。

7月29日凌晨,日本侵略军在天津市实施了野蛮的炮轰、飞机轰炸、抢劫和纵火暴行。他们施暴的目标除了河北省政府 在天津河北区 之外 主要矛头对准了南开大学 然后是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张伯苓惨淡经营的南开学校天津部分全部遭难。

7月28日夜,在南大校园留守的有黄钰生、杨石先、郭平凡(男生宿舍舍监)几位职工和少数学生。次日凌晨1时 他们开始听见多处枪声。拂晓 驻在海光寺的日军开炮了。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 第二炮就打南开大学 以木斋图书馆的圆顶为目标,一炮未中 再炮击中圆顶 因为圆顶较重 垮下来就把图书馆部分压塌。随后多炮齐发轰向南大各建筑物。同时又有飞机在校园上空盘旋 观察命中情况。上午9时 黄钰生等仍舍不得离去 进入秀山堂办公

室留守。8时 秀山堂中一弹 从楼顶直穿到地理室 幸未爆炸。看来留守已无用处 只好组织留守职工撤退。在思源堂后河边乘上备下的小船 黄钰生与杨石先、郭平凡和职工乘两条船驶离岸边向青龙潭方向划去。敌机侦察见到目标暴露 便骤然向人船集中炮火射击。

船行里许到王顶堤村。这时听枪炮声已稀疏。黄、杨二位负责人已仓促出校 诸事待理 于是商定由黄钰生与职员郭平凡、张新波、赵世英和学生五人返回校园。另一船则载杨石先等经由墙子河支流转吴家窑、佟楼进入英租界避难。

黄钰生等一入校园 但见弹壳星布 寂无人声 残垣断壁 不忍卒睹。

黄钰生指挥余下职工进行巡查，正在议计如何觅船搬运图书馆残存图书时 又闻枪声大作 急回秀山堂 集合留校人员 避入地下室。随后就听见芝琴楼门窗玻璃碎落声 秀山堂中弹爆炸声。大家合计此地不可久留 决定再度突围。但因弹雨密集 走出又折回，曾有与秀山堂共吉凶之想。不料守候校大门工友霍文来报 日本坦克已开到六里台 正向八里台开来。大家商议后认为与其被日寇俘获 不如冒火网冲出。遂由黄钰生带领二次突围 沿墙爬行 到思源堂后乘船处 鱼贯上船 在枪炮声中驶离南开校园。行至八里台村小桥附近 遭遇日本飞机投弹 郭平凡倾身躲避 失身落水中 危急之际 由同人伸手提携 复归船上。船经吴家窑、佟楼平安进入英租界。登马场道大桥时 回首西望 但见校园火焰冲起 黑烟直上云天。同人们凝视良久 不觉凄然。

事后据八里台村民目睹者说，下午炮停时，有一长列日军卡车 满载什物 从南大运到海光寺。原来停止轰炸是为了劫掠。日寇对不设防的南开大学所施暴行 就是在炮轰之后 继以抢劫 再继以炮轰 最后用汽车拉来煤油和纵火材料 对校园全部建筑物放火焚烧，南大成了一片火海。劫难由 7 月 29 日晨持续到 30 日下

午，整个南开大学美丽校园变成了一片焦土。秀山堂、木斋图书馆、男女学生宿舍、东西柏树村教职宿舍，以及邻近校门的单身教员宿舍楼，均夷为平地，思源堂剩下骨架残骸。300名学生暑假寄存在校的图书和行李，以及百余名教师职工的家私财产也受到劫掠或被付之一炬，损失难计。

抗日战争胜利后，从日本东京只找回了一万多册原南大馆藏西文图书。但数万册元、明善本，一本也没有找回来。海光寺大钟也渺无踪影，无从查索。

这里附带记录一笔，在这两天里，日本飞机轰炸了南开中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笔者家居南开中学附近联兴里，是为当时轰炸的目击者。轰炸时附近居民不敢躲在家中，都跑出来藏在胡同的隐蔽一侧，看见空中贴红膏药标志的大型日本飞机，飞行高度不算高，飞机翼下挂的炸弹历历在目。但见日机突然机翼倾斜，向下俯冲，邻人以为日本飞机摔下了，方要拍手高兴叫好时，谁知竟是投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房瓦和窗玻璃也是震震作响，令人惊心动魄。事后查视南开中学南院的教学楼“南楼”和单身男教师宿舍“西楼”女子中学教学楼和小楼均被炸毁并着火。南开中学北院在战争期间由日军进驻养马，亦受到严重破坏。南开学校的天津部分遭到了全面的破坏。这一段历史是我们世代向青年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永恒教材。

（肖友惠）

日本侵略者杀害了我父亲

编者按：被侵华日军派人杀害的赵天麟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我叫赵寿民，现在河北省保定市化工部第一胶片厂外事办公室工作。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我讲一下我自己的遭遇。我 1930 年生 in 天津。先父赵天麟是一位教育家，生前曾担任过天津北洋大学校长、天津开滦矿务总局协理和耀华学校校长等职务。我有过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美好的童年。

1938 年 6 月 27 日早上我和哥哥弟弟正在客厅玩耍突然听到叭叭几声枪响，马路上人声嘈杂。我从窗户中看到几个人拿着枪跑到马路对面。这时警笛大作，还夹杂着一些零星的枪声，不时地有一些英租界警察和便衣在我家进进出出。到 10 点钟左右才听说我父亲被日本特务派遣的杀手从背后打了几枪，把他杀害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暴行给我家带来极大的灾难。在我稍稍长大之后，我从亲属口中才知道了一些真相。1937 年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大肆轰炸天津的机关、学校和民房。炸毁了南开大学，又把北洋工学院作为兵营，南开中学也受到严重破坏，使众多市民家破人亡，众多师生无处上课学习。我父亲激于民族义愤，在耀华学校开设特班，招收了南开中学 1000 多名学生，南中的教师也大部分转入特班执教。对于自愿参加抗日战争的，我父亲都给予资

助。当时日伪天津市教育局，强迫各校删改课本，耀华学校由于地处租界地，仍然使用原有教材，升中国国旗，师生们高唱爱国歌曲，抒发了沦陷时期天津人民的爱国情绪。日本当局对耀华学校和我父亲极为仇恨。他们先是造谣说耀华学校藏有枪支弹药，是抗日的大本营，接着又派日本宪兵进校“参观”。我父亲挺身而出，严词驳斥了日本兵。这更激怒了日本侵略者。于是日本特务中村上尉主持的暗杀团派了两个杀手，刺杀了我父亲。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懂得这笔血债要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头上。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千千万万无辜的老百姓，他们欠下中国人民的血债是永远偿还不清的。而广大的日本人民也同样是受害者，他们也痛恨这场战争，更痛恨那些军国主义战争狂人。

时间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国际风云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两国人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我们两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完全应该互相支持、共同发展自己的经济，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昌盛、繁荣做出贡献。今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我们应该永远记住 30 年代这一段血的历史教训，共同努力进一步发展友好睦邻关系。这是我们这一代义不容辞的责任。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

（赵寿民）

日帝派遣特务暗杀 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

1938年6月27日晨 天津英租界伦敦道（现和平区成都道）发生了一起暗杀事件，死者是有社会地位的耀华学校校长兼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董事长赵天麟。事情发生后引起全社会的极大震动。

赵天麟 字君达 1886年生，天津人。他是天津首批资助赴美的留学生 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 回国后从事教育事业 曾任北洋大学教授、校长 开滦矿务总局协理。1931年起 任天津私立耀华学校校长。他是一个热情的爱国者，1916年就曾积极参加天津人民反对法帝国主义强占老西开的斗争，是晋京请愿的代表之一。抗战爆发前后 在祖国危亡之际 他热情奔放 不遗余力地呼吁救国。

天津沦陷后 天津市大、中学校有的被炸毁 有的学校被日军当作兵营 大批学生不能返校读书。赵天麟利用租界这块还未被日军占领的土地 在耀华学校成立特别班 收容各校的失学学生。尤其是南开中学校舍被毁后 大批学生进了耀华。校舍容不下 就上午、下午开不同的班次 以挽救失学的青年。

日本侵略者在津利用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凡有中国国旗标记的读物 有三民主义内容的书籍都列为禁书 通令各校禁用旧课本。1937年10月中旬 伪天津治安维持会又通令各机关、学校 取消一切纪念日 要悬挂孔子圣像 并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做为大典纪念。另外 还删减课本、删改我国地图、强设日语课、